

从长时段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张太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① 放眼历史的长时段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演进，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在中国入地生根。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倾向和思维习惯上存在多方面契合，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②

（一）天下为公与为人类求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其主旨不仅是“解释世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21STA001）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18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而且是“改造世界”，也就是努力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幸福。郭沫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要怎样才能得到最高的幸福”的学说。^① 中国传统也讲求“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民族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践履”。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只有“内圣”落实到“外王”才有意义和价值。“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② 要经营天下，必须先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形成一种内在约束，从而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说，中国有“以思想治国”的传统，而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注重个人修养，注重“思想建设”，主张改造社会要先有理论的武装，要求人们以共产主义的道德修养作为行动指南。

胸怀天下，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践行路径，与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掌握先进理论、树立理想信念、为人类求解放，是非常吻合的。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曾号召国人“改造中国与世界”；^③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④ 他的世界主义理想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⑤ 这既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追求，可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典型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度和内在追求。

（二）天人合一与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⑥ 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主张从实践的角度、从人的主体地位去“人化自然”。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存在一致性。《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⑦ 《易经》指出，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在自然界中，天

① 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洪水》第1卷第7期，1926年1月1日，第215页。

②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③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④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0、394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2页。

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⑦ 郭庆藩：《庄子集释》（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9页。

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①《庄子》中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②人死后到哪里去？能感知的现实世界之外有没有神灵或天国？这些问题不予探究。东汉王充的《论衡》更是体现了较为系统的无神论。中国人常说：“读书人不信鬼神！”因此，试图寻求新的精神家园的中国人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会感到难得的思想上的共鸣！毛泽东曾指出，“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③“民”为“宇宙”之一部分，若其心“皆动”，则可为“天下之事”。这样的认知，显然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化自然”提供了条件。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运用唯物史观指出，“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道德“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④

（三）民为邦本与人民创造历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任何历史的画卷都不能展开。人民群众是历史演进的“剧中人”，又是历史进程的“剧作者”。^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如“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⑦“民者，君之本也”；^⑧“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⑨“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⑪“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⑫“人视水见

① 《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27页。

② 郭庆藩：《庄子集释》（上），第83页。

③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85—86页。

④ 李大钊：《物的变动与道德变动》，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5、1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⑥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30页。

⑦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页。

⑧ 《春秋穀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160页。

⑨ 《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85页。

⑩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4页。

⑪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5页。

⑫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635页。

形,视民知治不”。^①以民为本、为民谋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1919年,毛泽东写下《民众的大联合》,其中一方面讲道:“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另一方面又讲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②他既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讲到“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体现了“民为邦本”与“人民创造历史”的契合。

(四)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而中国自古就有大同社会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④这两种思想勾画的理想社会都极具吸引力,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早在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之初,就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说法。梁启超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⑤“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⑥1919年,在新的世界变局下,李大钊提出,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⑦他

① 《史记》卷3《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3页。

②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341、393—394页。

③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④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62页。除此,《公羊传》还描绘过“太平世”的景象:“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74页)这与大同社会的憧憬相得益彰。

⑤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第18页。

⑥ 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第46、47、48号合本,1904年2月24日,第302、303页。

⑦ 《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还号召,“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我之主张世界人类普遍的联合,各民族间无亲疏的差别”,“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①正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明显以大同来理解和阐释共产主义社会。

1923年,瞿秋白在《赤潮曲》中歌颂十月革命,写道:“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②“共产”与“大同”并用,充分说明二者的相通与契合,还有以“大同”对“共产”的理解。同年,孙中山在给日本人犬养毅的信中,以中国古代的大同来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③1926年,郭沫若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作了一个奇妙的设想。马克思到访中国的孔庙,与孔子进行了一番对话。两人的对话表明,他们思想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竟“不谋而合”。这令马克思不禁对孔子“感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老同志!”^④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儒家思想,还有诸子百家学说。在艾思奇看来,“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这些“种子”散布在中国传统的各种思想和学说中,无论中国历代的何种思想,大都有积极向上的追求,那就是对理想的生活和社会的追求。他认为,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相合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⑤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指出,“认为人类由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未来社会主义的五阶段论,使人联想到了公羊派有关‘大同’的淑世观点”,“在所有的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无疑距中国思想之基本方向最近”。^⑥这种相近相通相合,无疑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在各种相互激荡的政治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也颇能解释现代中国思想演进的趋势和结果。

①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第155页;《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个自杀的青年》,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78、94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60、361页。

③ 孙中山:《致犬养毅书》,《孙中山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6页。

④ 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洪水》第1卷第7期,1926年1月1日,第217页。

⑤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第26号,1939年4月28日。

⑥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580页。

二、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而丰富的契合性,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演进中的主流思想,并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由于怀揣大同社会的理想,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吴玉章在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转变”时指出:“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①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②后来,他谈道:“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③共产主义不但适合解决“全民族”面临的问题,而且还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思想“胃口”。

五四时期林林总总的学说与思想,到20世纪30年代初,化约为三大鼎足而立的“主义”。上海《民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④其中,新月派代表自由主义。可以说,当时鼎足而立的思想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三大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政治。

1933年,《东方杂志》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向知识界征文,引发强烈反响。其刊发的100多篇征文,大都表达了对于大同和社会主义的梦想。柳亚子指出,“要有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该先有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这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而我们中国呢,当然也是这大联邦内的一个部分。”谢冰莹的文章写道,“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工作,这工作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和整个人类所需要而做的。他们过着很快乐的自由平等的生活”,这“就是没有国家,

①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编:《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058—1059页。

②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89页。

③ 《毛泽东关于外交问题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册,第184页。

④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4页。

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陈时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梦想，自然是趋于这一途”，“注重劳苦民众的幸福，将来的复兴，才能够如花的灿烂；到了我国强盛以后，再为世界上打不平，希望于百年以内，与全人类共同促进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杨杏佛的文章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顾凤城的文章指出，“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张申府的文章写道：“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够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① 不难发现，这些文章无论是概念运用，还是内涵意蕴，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的契合性。在这些人笔下，二者有机糅合在一起，大家都梦想这样一种社会的到来，充分表明中国即将走向何处。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尽管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鼎足而立，但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三民主义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当时的思想界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自由主义者胡适敏锐指出，“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② 虽然胡适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又不得不面对思想界的现实。实际上，他自己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后来说，“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③ 所谓“一班知识分子”，应该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有人认为，“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④

在国民党主办或控制的报刊上，马克思主义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提起或运用。如唯物辩证法、社会形态演进、社会主义趋势、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等本来属于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在国民党的话语中时隐时现。对于国民党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并不是完全禁忌的。被国民党当成理论家的戴季陶、叶青、陶希圣三人，都或多或少受过马克思学说的洗礼。如此情势，在具有“以思想主政”传统的中国，谁胜谁负大概早已成定局。^⑤

① 柳亚子等：《梦想的中国》，《东方杂志》第 30 卷第 1 期，1933 年 1 月，第 2、8、9、44、57 页。

②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 77 号，1933 年 11 月 19 日，第 3—4 页。

③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34 页。

④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 年，第 126 页。

⑤ 在黄道炫看来，历史的“潜势力形成的冲决性力量，常常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参见《历史的潜势力——读〈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6 期。

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44年7月,毛泽东对英国记者斯坦因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①一位外国研究者发现,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②历史上的“典故”如果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合相应的因素,大概无法用来阐述“共产主义”,并使之“通俗易懂”。如果中国人头脑里没有相应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也不会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就能解释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③“日用而不觉”,是文化“土壤”的一种形象表达,是在思维模式上的“暗合”或“无意识融通”。

傅斯年后来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④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也在此列。新中国成立前夕,钱端升就明显感受到,“这些新来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体现着中国人的所有美德,而且同时也是非常马克思化的”。^⑤这可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入地生根的生动写照,亦如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认知,即“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⑥“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⑦“中国人的所有美德”和“非常马克思化”有机统一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形象真切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度自觉

信仰马克思主义,又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

②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191页。

③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④ 《胡适日记全编》(5),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4页。

⑤ 钱端升:《致费正清》(1949年5月23日),转引自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⑦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定位。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有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自觉。毛泽东论述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创造“中国新文化”的理论成果。^①1943年，中共中央特别强调：“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结合起来。”^②两年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写进党章。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不断进行实践探索的过程，亦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过程。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③1953年，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④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道：“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⑤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⑥1964年，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一名学生来信的批示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发展方针。^⑦这些关于文化发展方针的用语，特别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进入新阶段。典型体现之一，就是邓小平借用古语，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称为“小康”。^⑧邓小平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⑨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承接了中国传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5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1页。

③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④ 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70—571页。

⑥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3页。

⑦ 毛泽东：《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27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统的小康思想，还顺应了现代化发展潮流。“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又力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结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了更高的自觉，这种高度自觉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通性更加清醒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经常引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故、经典诗词和名句加以佐证。在谈到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时，他引用了“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③ 在讲到领导干部要有人民情怀时，他引用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④ “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出深林”，^⑤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⑥ “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⑦ 在告诫领导干部要了解民情、体恤百姓、为百姓办实事时，他引用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⑧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⑨

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⑩ 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他作了进一步强调。^⑪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种高度自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⑤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257、26页。

⑥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⑦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

⑧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257页。

⑨ 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2页。

⑩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⑪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7页。

乃是出于对两者契合性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认知。^①没有“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对马克思主义的承载和滋养，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是在启蒙思想中产生的，有着坚实的启蒙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经历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此间“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②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优秀”部分，比如封建性因素，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邓小平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思想方面仍然残存着封建主义的影响。^③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批评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封建依附”关系。^④为此，他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⑤“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⑥这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警惕，也充分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相结合的高度自觉，并在新时代产生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以下略举几例。

其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全世界的和平安宁、共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⑦“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鲜明体现出“天下为公”的胸怀和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国都要“行天下之大道”，“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⑨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思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18、24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30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5页。

④ 习近平：《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69—770页。

⑤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在服务 and 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光明日报》2021年3月26日，第1版。

⑥ 《“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记“十四五”开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考察调研》，《人民日报》2021年3月27日，第3版。

⑦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14—515页。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7页。

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62、63页。

想明显蕴含其中。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①“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②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发展不能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③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鲜明体现了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之有度”等中华传统生态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三，坚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④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⑤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⑥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

其四，“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发展。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⑧“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⑨“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⑩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

①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第21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23、11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6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46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⑧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⑨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2页。

⑩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②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③ 中国共产党有关“共同富裕”的认识和表述，蕴含着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生活景象和价值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极其丰富，远不止以上四个成果。总之，从长时段来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文化正在遭受批判，西方文化备受崇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各种外来思潮而一枝独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类似的“种子”。经过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扬弃，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得以张扬，并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最终实现凤凰涅槃。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成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两个结合”。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两个结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度自觉，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力量。

（责任编辑：焦 兵 赵 懿）

①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22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